

中國應用文發展史

劉壯著

中国应用文发展史

刘 壮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应用文发展史/刘壮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ISBN 7-5013-1192-7

I. 中… II. 刘… III. 应用文-写作-研究 IV. H1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7969 号

中国应用文发展史

刘壮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原子能出版社照片排版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0印张 188千字

1995年6月北京第1版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册

ISBN 7-5013-1192-7

I·92 定价: 9.1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古代的应用文的概念.....	(1)
第二节 应用文的重要地位.....	(6)
第三节 研究应用文发展史需要注意的问题.....	(9)
第二章 应用文的原始形态	(16)
第一节 应用文的口头形态	(16)
第二节 应用文的物画形态	(18)
第三节 从古代神话看应用文的原始形态	(20)
第三章 先秦应用文	(23)
第一节 书契形式	(23)
第二节 最早的应用文 ——殷墟甲骨刻辞及钟鼎彝器铭文	(25)
第三节 第一部以应用文为主体的文章集 ——《尚书》	(30)
第四节 应用文发展的重要时期——春秋战国	(35)
第五节 先秦应用文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轨迹	(59)
第四章 秦汉应用文	(65)
第一节 概说	(65)
第二节 公务应用文趋于规范	(68)
第三节 私人应用文重要发展	(90)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应用文	(107)
第一节 概说.....	(107)
第二节 公务应用文体裁的沿革、特点与名篇	(109)
第三节 私人应用文体裁的特点与名篇.....	(136)
第六章 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形成	(156)
第一节 汉代文论与应用文功用.....	(157)
第二节 魏晋文论与应用文功用、文体辨析 和写作规律.....	(159)
第三节 南北朝文论著述表明应用文写作理论形成.....	(166)
第七章 隋唐宋应用文	(175)
第一节 概说.....	(175)
第二节 应用文体裁沿革.....	(179)
第三节 应用文名家名篇.....	(201)
第八章 元明清应用文	(221)
第一节 概说.....	(221)
第二节 应用文的体裁沿革与名篇.....	(223)
第九章 应用文的变革	(231)
第一节 应用文的重大变革.....	(231)
第二节 应用文体裁的特点.....	(234)
后记	(237)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古代的应用文的概念

一、应用文名称的由来

“应用文”一词，一般认为出自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然而，刘熙载的原意，并不是把这一名称作为专门的文体概念诠释其内涵，而是强调“应用之文”的实用性。所谓辞命，本指古使者聘问应对的言辞。《艺概·文概》中说：“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把这些阐述联系起来看，首先是说明，行人出使受命，在具体场合要因时适变，应对要言词通变，“其用却全在善道”即强调了“用”；其次是由此推之，“一切应用之文”重在实用，强调了实用性特点。刘熙载的阐述尽管不是诠释应用文概念，但已论及应用文注重实用讲求实效的根本问题，对研究古代应用文发展史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至于他所说“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主要指应用文体中的公文，故有上行、平行、下行之分。“公文”一词，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较早可见的如《三国志·赵俨传》中有：“公文下郡，绵绵悉

以还民。”再如《后汉书·刘陶传》中的：“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此外还有案牍、文牍、文案、公案等名目。如《新唐书·张九龄传》：“臣以谓始造簿书，备遗忘耳。今反求精于案牍，而忽于人才，是所谓遗剑中流，契舟以记者也。”《唐书·李巷传》：“天资长于吏事，治家亦勾检，案牍簿书如公府。”《宋史·梅执礼传》：“文牍山委，率不暇经目。”《南史·彭城王义康传》：“性好吏职，锐意文案。”《东坡奏议集·辨黄庆基弹劾劄子》：“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案，原指食器，后指凭几，引为官府处理公事的文书、成例及狱讼判定。牍，原指木简书板，纸张通行后称书信为尺牍，如《后汉书·匈奴传》：“汉遗单于书，以尺一牍。”案牍在古代诗文中也有所见，如谢朓《落日怅望》：“情嗜幸非多，案牍偏为寡。”刘禹锡《陋室铭》：“无案牍之劳形。”现代研究应用文，根据用途分为私人应用文和公务应用文即公文，刘熙载所说的应用文当指后者。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应用文一词再早可见的，是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拙轩集·卷五》），开篇就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但是，张侃虽然早刘熙载六百年使用了应用文名称，理解却完全不同。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还没有把应用文体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也没有把“应用文”作为一个专门的文体概念，张侃所说仍然不是对这个概念的完整准确的诠释，仅仅是从表达形式上着眼来予解释；其次，古人不同的解释，并不单纯是对一个概念的内涵的理解问题，深入一步考虑，还关系到古代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体）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文笔说”与应用文

按现代文章分类，应用文体是包含在一般文章之中的。但古代“文”或“文章”的概念，其外延曾是非常宽泛的。先秦时曾把礼乐法度称为文章，如《诗·大雅·荡》序：“无纲纪文章。”《左传》中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指的则是文采；《庄子·胠篋》中也有：“灭文

章，散五彩。”而“文学”本指儒学或其它学术。到两汉之际，文章与文学逐渐合一，指语言的书面形式。如《论衡·正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再如《史记·儒林列传》：“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王充所论，包括了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司马迁所说的诏书律令无疑属应用文，也在文章概念之中。

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的认识，自汉代始有“文笔”的提法，最早见于《论衡·超奇》：“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但这里谈的还不明确。到南北朝时文和笔进而分为两个词，出自《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此时文与笔已各有所指。据说颜有文、笔、言三分法：有文采且押韵的是文，指诗、赋；有文采的是笔，如《左传》；直言事理不加彩饰的是言，如《尚书》等其它经典（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其后刘勰对文、笔的区分着眼于是否用韵，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并于《文心雕龙》中屡用文、笔，如《章句》中有“文笔之同致也”，《序志》中有“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该书体例就据此而定：第二部分文体论共有“论文叙笔”二十篇，前十篇谈有韵文，包括《诗经》、乐府、赋；后十篇谈无韵笔，主要是应用文章。同时在《体性》、《风骨》中也强调了“文”的风格与情采。萧统《昭明文选》的编选也体现了这种看法。他尝试将学术与文学、文章区别开来，不选经籍子史（史传中只选有文采的颂赞）；并在该书《序》中提出“能文为本”，能文的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翰”。他力图划分文与笔的界限，选入了诗、赋等文学作品；但是又偏重从辞采的角度选入大量六朝骈体应用文，如令、教、诏、奏记、弹事、表、笺、符命、铭、箴、谏、哀、碑文、墓志、书、行状等。这种从表达形式上的区分，是人们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异的初步认识。

比刘勰稍后的颜之推则有了深入一步的认识，在《颜氏家训·

文章》中提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里从渊源、功用上考察，指出“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的与“陶冶性灵”的有所不同；并把诗歌一类缘情作品单独提出来，视为另有特点。所谓“陶冶性灵”，应该说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的。与此同时的梁元帝萧绎著《金楼子》，在《立言》中文、笔对举，“情灵摇荡”、“流连哀思”抒写情怀又有一定艺术特点的为文，如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善为章奏”、“善辑流略”的论事说理实用文章为笔，但也要“神其巧惠”，讲究技法。这是从文章、文学性质考虑的。可以看出，人们对文章、文学的认识逐步深化，从表达形式的区分深入到性质、功用的差异。

但是，唐宋时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又使文章作为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了文学作品。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中有：“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这里所说的文章主要指文学作品。再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论庾信后期的文章就兼指诗、赋。也有时人们使用文学或文章的概念在内涵上并无区别，如韩愈《答窦秀才书》中就有“遂发愤笃专于文学”。到元明清时代，小说、戏剧发展繁荣，对文学观念产生影响。直到“五四”前后，文学逐渐独立，有些学者提出了“美文”与“实用文”。叶圣陶先生1924年在《作文论·引言》中提及“文学”和“普通文”的概念。又于1945年在《国文教学》上辑《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指出：“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得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

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他进而从文体角度指出普通文包括应用文、记叙文、论说文。叶圣陶先生把国文中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的文章称为“基本观念”,表示“我作这么想,差不多延续了二十年了”,足见对此给予了特殊的重视,经过了深思熟虑。明确了这个基本观念具有分疆划界的重大意义。至此,人们对“文学”与“一般文章”这两个概念各有所指才认识得比较明确了;同时,也明确了按现代文章分类应用文体裁是包含在一般文章的范畴之中的。也正是因为把应用文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人们才可能在此基础上把“应用文”一词作为专门的文体概念,去科学地解释其内涵。

由于历史上对一般文章与文学作品的差异有这样一个逐渐认识过程,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不同历史时期对应用文的不同理解。例如刘勰论文体首先着眼于从表达形式上区分,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即便是“有韵文”也有不少属应用文体,象颂、赞、祝、盟、铭、箴、谏、碑、哀、吊等。因此,把张侃所说结合唐宋文学观念变化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受到认识上渐进过程的影响,他不是首先从文章与文学性质、功用上的差异考虑应用文属一般文章的范畴,而仅仅是从表达形式的角度来予解释,这是历史的局限性。

至于骈四俪六,在历史上确实有过应用文章多用骈体的现象;然而,骈四俪六并不限于应用文体,也不限于一般文章。骈体文本是从古代诗文中排笔对偶的修辞手法演变来的,尤其受汉赋影响,到魏晋时代完全形成,在南北朝时极为盛行。南北朝时,除史传等少数之外,其它文体几乎都有用骈文写成的。像清代许梈编《六朝文絮》,收骈文七十二篇,有应用文五十余篇。同时代的李兆洛编先秦至隋骈文总集《骈体文钞》,共三十一卷,上编十八卷谓“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基本上是应用文;中编、下编为指事述意、缘情托兴之作,也有不少应用文。但唐宋古文复起,只有诏令、奏议、颂赞以

骈体为常,其它如传状、序跋、书信、杂记等则多用散体。而且骈四俚六也用于文学作品,在《六朝文絮》、《骈体文钞》中就有所见;及至清代骈文复兴,有以四六体用于小说的。就此而言,张侃所说的“骈四俚六,特应用文耳”有合理性仍有局限性。其局限性在于,一方面忽略了骈四俚六并非仅限于应用文,另一方面忽略了应用文并非全用骈四俚六。若以他的解释为据,则远远不能把先秦以来的各种公务、私人应用文都予以包括。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古代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体)与文学作品的差异有逐渐的认识过程,应用文的名称出现较晚,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所以,尽管古人使用过“应用文”这一名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作为专门的文体概念,也没有对其内涵做出科学的解释。这是研究中国应用文发展史时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应用文的重要地位

应用文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比较晚,有的现代学者认为,由于应用文是处理公、私事务的实用性文章,不具艺术性,历史上一直有偏见,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见解不无道理。古代有些应用文确实不如文学作品流传广泛,研究应用文写作理论的专门著述也很少见。但原因是复杂的。实际上,古代私人应用文名篇佳作流传非常广泛,象书信、碑志、哀谏祭吊、传状、序跋等体裁,在后代辑纂现今可见的历代文选、散文选中,就占有很大比重;而刘熙载所说的上行、平行、下行公文,在古代应用文中有重要地位,尽管有所流传(如诏、策、敕、令、谕、书、疏、状、启、劄子、封事、表、议、移、檄等),但却有限。例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阅皇家藏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编制总书目《七略》,并没有把章奏表议等

公文专略收录。东汉班固在此基础上著《汉书·艺文志》，也只是把公文编入相关门类，如《六艺略》的《书》卷附列奏议四十二篇。有的朝代曾出现过少量公文集，如两汉之际汇编《百官箴》，东汉献帝年间编《汉仪》，唐宪宗命唐次集历代史料纂《元和辨谤略》，宋代赵汝愚编《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明代黄淮、杨士奇奉成祖命纂《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也有过个人集，如唐代陆贽的《陆宣公奏议》。可是，仍有不少被誉为公文大手笔的，却极少传世之作。象南宋汪藻，在南宋初渡时，制诰诏令多出自他之手，行文洞达激发，颇为时人传诵，却散佚甚多。同时，探索公文写作规律的专著也较少，只是个别朝代曾出现过传授公文写作知识的，如清代有《奏折体例辑要》。

对于这种历史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公文撰拟具有专任性。封建朝代公文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必须由指定的专人撰拟。一种属于“职述”，即由担任某个职务的人写与其职务相称的公文，违者贬官治罪；另一种是“授权代拟”，即有专门从事公文撰拟的机构和人员，拟前授权拟后批准，像进呈皇帝书行的称“进画”。尽管封建社会幕宾师爷代笔司空见惯，但这种专任性势必影响到公文的辑录。其结果，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总结的“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二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作为职述的个人奏议（或集），而出自文人之手的诏令制诏则很少见。第二，古代公文写作习惯于以吏为师，虽然有的朝代对公文体制有所规定，也有过传授公文知识的个别书籍，但总的来看公文写作还是相沿成习的。第三，古代公文也具有保密性和时效性，它是封建朝代政治的外在表现，有些公文在起到策令作用的同时，又有限定的使用范围和时间界限。这些因素，使公文不像私人应用文和其它一般文章，更不像诗词歌赋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相对来说它缺少开放的社会环境，处于一定程度的封闭状态，必然影响到公文的流传和在写作规律上的探索。

但是,并不能就此认为古人对应用文章不重视,也不意味着应用文无写作规律可言。相反,古代对应用文是非常重视的。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著《典论·论文》,明确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指位显赫)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以隐约(穷困)而弗务,不以荣乐而加(移)思。”参照文中例举的王粲、徐干、蔡邕、张衡的辞赋,和陈琳、阮瑀、孔融的章表书记,结合当时“文章”概念的内涵,可以看出所论包括应用文章。《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专篇论文,就高度评价了文章(包括应用文体)的价值和功用,认为是经治国家政事的重要工具,有很高的政治作用,有与立功、立言同样重要的地位,有比个人荣乐、生死更深远的意义,可以垂世不朽。以曹丕的地位,作出如此评价,古人对应用文的重视程度是显而易见的。其后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也有相近的论述:“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枢机在汉代为朝廷机要部门或职位,如尚书、中书、宰辅。以枢机喻关键,足见章表奏议这样的应用文在经治国家政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见解从《文心雕龙》本身也能体现出来。全书文体论共二十篇,有《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其中有十四篇共详论三十四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又于《书记》中简述二十四种文体,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中《文心雕龙》是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著,如果结合其中的创作论,可以认为该书主要讲的是文学创作;然而,也确有大量的关于一般文章尤其是应用文体的论述见于文体论中,这是客观的事实,无疑能够充分表明当时对应用文章同样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从后人《文心雕龙》的研究中也能反映出来。清代著名学者纪昀(晓岚)评点《文心雕龙·封禅》时指出:“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

非,故封禅为大典礼,而封禅文为大著作。特出一门,盖郑重之。”古代封禅典礼的是非姑且不论,仅就刘勰把封禅文单列一篇予以专论而言,所谓“郑重之”,不也反映了当时对应用文章的重视程度么?

至于应用文的写作规律,其实古人也进行过探索。像前文所举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提出“善为章奏”、“善辑流略”的文章要“神其巧惠”,就是从写作艺术的角度,指出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体在写作中需要智慧,讲求技法,这就是在探索应用文的写作规律。特别是在汉魏六朝王充、曹丕、陆机、挚虞、刘勰、萧统的著述中,关于应用文写作理论的研究大量可见,论题包括应用文功用、文体论、写作规律论及重要作家作品评价。从应用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魏六朝是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形成时期。不过,正如前文所谈,由于古代对文章与文学的差异有逐渐认识过程,所以古人对应用文写作理论的探索、研究多散见于有关的文论著述之中,这正是我们在研究应用文发展史时需要加以整理、概括、总结的。

第三节 研究应用文发展史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

中国应用文发展史指自先秦至“五四”以后的应用文发展的历史。不过,研究应用文发展史并不等于排列历史现象,也不是只评论历代应用文章,几千年应用文的发展是有迹可寻的。研究发展史固然要重视历史资料,如果没有历史资料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然而,如果只排列历史现象,只能算是“资料长编”,而不具“史识”。我们的目的毕竟不在于搜集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探寻应用文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是在研究中首先需要注意的。在评论

应用文章时,道理与此相同。应用文的发展主要是文章写作实践的发展,谈史自然不能离开文章。但是同时还需要注意,应该把文章放在应用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究竟与前代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发展;如果论文与谈史相脱离,就成了孤立的“文章评论”或“文章赏析”。当然,要真正注意到上述两点是很不容易的。应用文的历史资料包括文章在内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探寻发展轨迹更非易事,我们只能说是在研究方法上尽可能的有所注意。

应用文有历史发展轨迹可寻,这里主要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应用文写作实践的发展,二是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发展。研究应用文写作实践的发展,需要特别注意文章体裁的沿革。其原因有二。第一,体裁是某类文章所特有的表现形态,文章因功用和内容不同,表现形态也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体裁。像应用文体属于文章范畴中的一大类别,又进而分为公务应用文和私人应用文两类,而两类之中又分为若干体裁。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应用文章都可以按体裁归类。第二,文章体裁在发展中具有比较稳定的表现形态,但又处于相对的变异状态。应用文由于社会发展需要、语言变化、其它文体影响和人们在实践中的创造等原因,体裁也在不断发展、演变。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上的应用文章几乎都与体裁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如果把这两点联系起来,从体裁沿革的角度,就可能理清几千年来的应用文写作实践的整个发展线索,从而探寻应用文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本书着重阐述自先秦至“五四”以后应用文各种体裁的形成、发展、演变。在介绍体裁沿革的同时,一是对应用文发展史上的名家名篇将做重点介绍,并适量选用原文避免空泛议论;二是对某些体裁初始的写作实践状况,也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以历史地看其发展。后者,例如私人家书,现存年代最早的是1975年出土的战国末期秦木牍家书,这与后代私人书信相比称不上名篇佳作,但从私人书信这种体裁的角度来看,是有历史价值的。

至于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发展,前文已经提及,中国古代应用文

写作理论形成于汉魏六朝。虽然“应用文”的名称晚至南宋才出现，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特别是由于对文章与文学的差异有逐渐认识过程，实际上古人对应用文这一概念的内涵并没有科学的解释，但是应用文的写作理论对于实践仍然有指导作用。象文体论，自曹丕始经陆机、挚虞、刘勰而形成，到稍后萧统编《昭明文选》就已经起到了指导作用。古人写作十分重视辨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指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因为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可以说，理清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发展线索对于研究应用文发展史有重要意义，既有助于认识历史上的应用文章，也有利于探寻应用文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应用文发展分期

本书体例是以史为纲，参考汉语文章学关于文章发展分期（见张寿康《文章学导论》），把应用文的发展分为七个时期。第一是原始社会的孕育时期。应用文起始于实用，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是以文字为基础。但是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人们出于生产、生活的各种实际需要，创造了原始形态的“应用文”，包括口头形态和物画形态。这两种原始形态是应用文的胚胎，而且物画形态与文字的产生有密切关系。本书用专章介绍应用文的原始形态，而没有采用古代文学史讲先秦文学通常包括从上古时代至秦以前的办法。这并不意味着“先秦”不包括原始社会，而是因为这个历史概念包括了应用文的孕育和发轫两个时期，为了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应用文孕育时期的概况，才用专章介绍。第二是发轫时期，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初期，即到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时期。所谓发轫，指随着文字的产生开始出现了最早的书面语言应用文章，进而形成了众多体裁，个别体裁始有名篇，并表现出应用文体的基本特点。第三是发展时期，即秦、汉时代。在先秦基础上，公务应用文趋于规范，私人应用文有了重要发展；几乎各种体裁都有成文之作，不少体裁出现了名篇，对后代有深远影响。第四是成熟时期，即魏、

晋、南北朝时代。所谓成熟,在于有三个标志。一是各种公、私应用文的体裁特点明显形成,众多体裁名篇问世。二是公务应用文在实际使用中发展得更加切实可行,已不仅仅是规范化。三是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的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当时对应用文写作理论的研究有三个特点:(一)论题全面、理论系统,(二)清楚呈现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三)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写作实践。为了使读者清楚了解这个理论在形成中的发展线索,本书用专章阐述中国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的形成。第五是高峰时期,即隋、唐、宋特别是唐、宋时代。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应用文受诗文繁荣的影响名家辈出名篇如云。这一章要重点介绍应用文名家名篇,并从发展史的角度看其究竟与前代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发展。不过,限于篇幅,只能从众多名家名篇中有选择地介绍,而且即使是名篇也一般不录其全文。第六是稳定时期,即元、明、清时代。所谓稳定,是与唐宋应用文高峰时期相对而言的。元代历史不长;明清时代应用文的体裁有所变化,但总体来说不如唐宋丰盛。不过,稳定也不能一概而论,明清公私应用文中的某些体裁也有不少名篇。第七是变革时期,即“五四”前夕至现代。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废止了封建时代所使用的应用文名目;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白话文运动,打破了文言文的一统天下,使白话文成为应用文章的主要特征。这是几千年应用文发展史中最重要的发展。当然,体裁和表达的重大变革,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内容的变革。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巨大的社会变革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制度任何朝代,应用文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这个分期是大体的;就具体而言,应用文各种体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例如,多数应用文体裁成熟于魏晋南北朝,而私人书信在汉代就已成熟,祭文则到唐宋时代才发展成熟。这是在考虑应用文的发展分期时需要注意的现象。

三、应用文体裁沿革